近代史老师关于期末考试题的介绍：

两道简答题（其中有一题出自于前七章课后习题）占50分

一道论述题（内含两小问，要求梳理大的线索和脉络，要注意充分论述，大概需要写足一面纸）占50分

例：论述戊戌变法

为什么有戊戌变法；

概述大概情况；

戊戌变法的成就

戊戌变法做得不太好的地方

别的班传的三道题。（2,3题答案均为百度，仅供参考）

1.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引起了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巨大变化？

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，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民主革命。在近代历史上，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救亡图存、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一个里程碑，它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巨变。

第一，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——清王朝的统治，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，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。

第二，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。

第三，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。

第四，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、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。

第五，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，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。

1. 从华夷之变评价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。

“中体西用”论的提出在洋务运动期间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，表现在：它突破了传统的“华夷之辨”，实现了从“鄙夷”到“师夷”的转变；它突破了不识西学、轻视西学的观念，开始向引进西学、重视西学的观念转变；它作为洋务运动的思想路线为洋务运动扫除了思想障碍，为洋务运动开启现代工业化生产方式开辟了道路。但“中体西用”的宗旨毕竟是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“体”，所以从其语境生成之始它就内含消极与落后的一面。随着西学引进的深入，其合理诉求逐渐被消解，进步作用渐渐丧失，愈来愈成为历史前进的阻力和障碍。

1. 从华夷之辩评价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  
    所谓“华夷之辨”其实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。因为文化包含甚广，有器物层面、制度层面、思想伦理层面等等。故此惟有将“华夷之辩”认同为文化的比较才显得妥当。“华”者，中华也；“夷”者，西夷也。“华”展示了国人对本土中原文化的认可与坚持。“夷”代表的是国人对非中原文化的否认与轻视。可以说自轴心时代确立了中华文化的主旨之后，“华夷之辨”（或被称为“夷夏之辨”）便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。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缺乏与其它文化的竞争，造成了停滞与僵化，到了近代与西方文化一旦交上手，才蓦然发现处于了危险的境地。古老的中华文化势必要吸收新的文化元素，以驱动自身的进一步前行，可是这对自身缺陷由认识到克服的历程却是痛苦的。近代以前中华文化的主旨不曾发生大的变迁，但这也就造成中华文化自身过于自大的心理。即所谓有“以夏变夷”，而未闻有“以夷变夏”，进而发展成了“道历千载而不变”的观点，将“中华文化”直接与“道”这个最高的哲学范畴划上了等号。   
     
   　　一   
    《治言》写于1889年，是谭嗣同25岁时的作品。该文写作时正处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，许多有识之士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，已再无兴致去空谈性理，“中国往何处去”成了思想界的中心问题。更由于鸦片战争的失利，表面上是军事的失败，故此国人对西方的坚舰巨炮印象深刻，洋务运动便应时而生。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个中翘楚，大力倡导“中体西用”说。他提出“中学为内学，西学为外学；中学治身心，西学应事变”。他又提出“夫不可变者，伦纪也，非法制也；圣道也，非器械也；心术也，非工艺也” 。

谭嗣同主张“今之中国，犹昔之中国；今之夷狄情，犹昔之夷狄情也”(同上，P236)。可见谭嗣同这时还以为中国依旧是“天朝大国”，仍是万国来朝的盛世之邦，礼仪之邦。中国以外，则仍是蛮荒野地，中国以外的人还是化外之民，这也就是所谓的“中体”说。但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大败，西方之强大已无须赘言。故此，谭嗣同认为在中体确立不动后，以西学为用，并以中学来驾御柔服西学。希望器物层面的学习就可以解决“华夷之辨”。   
  
二   
 甲午战争的失利，空前的民族危亡感由之而生。  
 谭嗣同业已认为真正的圣人之道不但为中国所有，亦为外国所有。有中国之利而无中国之害，师法西方乃为必然。故提出“尽变西法”。可见此时的谭嗣同是矛盾的，一面要变法，另一面却又念念不忘“唐虞之风、圣人之道”的复古。谭嗣同上述的变化中，很重要一点的就是他在学术上采用了王船山的道器观。就是“道，用也；器，体也”。这与自朱子以来作为主流的“道体器用”说是截然相反的。谭嗣同认为既然“器体道用”“道不离乎器”，那么“器既变，道安得不变”。（同上，155）这样，变法是势在必行的了。因为器变了后，道自然也会变；若不变法，道器就会发生分离，则器不成器，道不成道了。   
 此时谭嗣同的思想中有一点是明确的：华夷之争，再不能以洋务运动的“中体西用”来解决，不能只及皮毛，而不及根本；只看到表象，而不去究其本质。他认为“西国之治平，岂皆人心正于中国乎？”既然天下同此心，而我不如人，那就是制度的问题，所以谭嗣同大力倡导变法，希望通过制度的变革，使中国能在中西之争中觅得可胜之机。平心而论，他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，思想也有过激之处，但他敏锐的嗅到了症结所在。   
  
三   
 故此，“华夷之辨”在谭嗣同的《仁学》中再发新枝，更触及了文化比较的核心：寻求中西平等是其终极目标。

谭嗣同认为之所以君主乐于三纲，目的是为己之利益。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“称天而治，以天纲人，世法平等，则人人不失自主之权，可扫除三纲畸轻畸重之弊矣”，要“废君统，倡民主，变不平等为平等”。在现实层面他敏锐的发现轮船、火车、电报等现代工具已将世界联为一体，“闭关自守”式的不通乎中外已绝无可能，再紧守“中外之防”、“夷夏之防”的后果堪忧。只有破除传统习惯之对待观，立平等、自由、博爱的新观念，进而变法、通商才是自强而摆脱危难之途。我们可以说谭嗣同在其《仁学》里业已认识到华夷之争不光是器物与制度层面的比较，更是思想观念层面的比较。   
  
在近代“华夷之辨”的历史路径上，谭嗣同完成了“华夷之辨”中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的转化，更直指思想观念层面。其变法的失败更证实了“华夷之辨”的本质，是要缩小中西文化比较中更深层的思想观念层面的差距。可以说谭嗣同以生命让我们触到了“华夷之辨”的本质。